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文化研究

王冀生 著

非外借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文化研究

王冀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学说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从十个方面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近 3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以来从历史的轨迹、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进行的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文化品位和时代价值。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王冀生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2321-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高等教育—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716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何凤霞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5 插 页:2 字 数:257 千字

版 次: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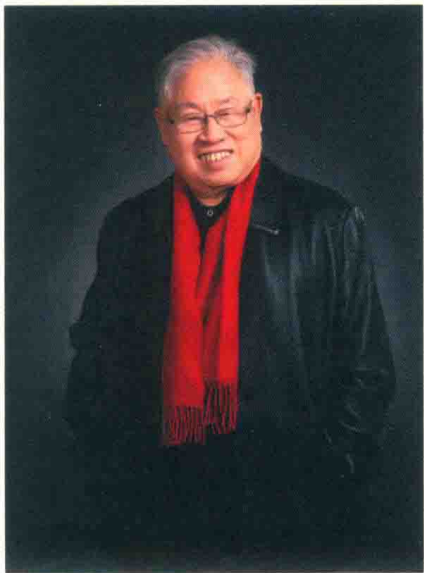
定 价:88.00 元

产品编号:079715-01

作者简介

王冀生,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镇人,1930年11月25日(农历庚午马年十月初六)出生于天津。1936年就读于安徽省安庆市天柱阁小学一年级,1940年就读于广西省桂林市中山学校,1945年就读于中央大学重庆市璧山县青木关分校高中一年级,1946年就读于北平市立男子第四中学高中二年级直至毕业,1948年9月就读于北洋大学采矿系一年级,1949年9月转学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二年级学习直至毕业。1952年8月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1955年8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师资研究生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并被任命为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教研室副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专业主任,同年被评为讲师。1978年6月调到原第八机械工业总局(部)教育局,历任副处长、处长,1980年评为副教授。1981年11月转到教育部(国家教委)高等教育二司,历任处长、副司长,正司级巡视员。1991年12月调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正司级),1992年评为研究员,1994年3月退休。

1981年11月至1994年3月在教育部高等教育二司和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结合工作进行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曾主持或参与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六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高等工程教育结构改革的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新时期高级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及其应用的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级重点课题“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研究与实践”,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级重点课题“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以及教育部



组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21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公开发表报告、演讲和学术论文近百篇,公开出版的自著或参与主编的著作有:《高等工程教育概论》(王冀生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 年 11 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王冀生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12 月)、《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王冀生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12 月)、《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张光斗、王冀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 9 月)、《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廖叔俊、王冀生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4 月)、《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王冀生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 9 月)和《宏观高等教育学》(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994 年 3 月退休以后,从 1996 年起主要进行教育理念创新研究和大学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演讲和报告百余篇,公开出版的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现代大学文化学》(王冀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月)、《大学之道》(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8 月)、《大学理念在中国》(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3 月)、《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王冀生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月)、《我的大学文化观》(王冀生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8 月)和《和谐评估:我的教育评估探索》(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在这期间,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由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和苏州大学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王冀生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10 月)。

在教育部(国家教委)工作期间,主要兼职有:第二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一、二届高等教育学科组成员,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第一届全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和第一届全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副会长。退休以后,从 2002 年 9 月起,应聘担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2009 年 4 月至今兼任“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2002—2012 年应聘担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顾问,2015 年 6 月至今应聘担任“中国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精品成果系列丛书”专家论证委员会主任。2017 年 4 月,应聘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顾问。

序

我和冀生同志交往已有 30 年了,由于他有在大学长期任教和教学管理的实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又在教育部高等教育二司长期从事全国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而且一直坚持教育管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加上退休以后长期潜心研究大学文化,所以,他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在这本书中,他从“我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到“西方教育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再从“一个中西两种文化矛盾和冲突的世纪”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发展、改革的艰难历程,既充分肯定了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更详细地记载了近代以来在中西两种文化矛盾冲突中我国教育从传统到社会主义转换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从“办学方向、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办学模式、体制改革、运行机制、对外开放、教育投入”八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基本要点”。他当时强调,“中国特色”指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与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框架的核心和灵魂”。

1994 年 3 月退休以后,从 1996 年起,冀生同志在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理念创新研究”逐步把重点转向“潜心研究大学文化”。在“教育理念创新研究”中,面对 21 世纪新的挑战 and 我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他以“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为指导,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文、科学、创新的统一”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进而以“和谐育人理念创新”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目标进行了再认识。在这个基

础上,2002年4月他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方面的开篇之作《现代大学文化学》问世,我有幸为他的这本开篇之作作序。他还积极推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全国有若干所重点大学和一批知名本科、高职院校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化论坛。在冀生同志主持下,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所百年左右历史的老校和近代以来有重大影响的名校陆续撰写出版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个案研究系列丛书”,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在此期间,冀生同志结合课题研究撰写出版了一批学术论文和多本大学文化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为创立中国大学文化学科作出了贡献。

“‘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发 展应当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是冀生同志在《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一书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以后,他进一步从“‘仁’和‘和’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以民为本,走向和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四个方面,进一步坚信不疑地认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和人们应当为之实现进行坚持不懈奋斗的崇高信仰,理所当然应当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由此可以看出,“以人为本,走向和谐”是冀生同志积 30 年从事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悟出的精华所在,也为他撰写这本《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冀生同志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就在“人”,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冀生同志就认真学习和努力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精辟论断有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学说在当代中国的继承与运用和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卓越思想在我国教育战线上的深刻体现，也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并指明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的根本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他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为指导，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理论基础，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方向、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要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促使我国高职教育向中高端进军、扎根中国大地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建设、培养一支“师者仁心，为人师表”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走向和谐十二个方面，初步构建了一个 21 世纪初“从‘公平质量’到‘教育强国’”，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启的一场新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的哲学思考体系，很有创意，是冀生同志作出的一个新的贡献。

冀生同志从进入大学学习至今已有七十载，大学毕业后一直奋战在我国教育战线。他一生勤奋好学，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总是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深入钻研，从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他涉猎之广，古今中外，都有引述和考证。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几十年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数量之多和见解之深也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因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在推动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工作中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不断开拓，积极进取。现在全国高等学校重视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工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已和十多年前大不相同，这和冀生同志近 20 年来持之以恒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冀生同志现在

已经年近九旬,仍然持续地关心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和我国大学文化的研究、建设,他的这种老骥伏枥的敬业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曾经说过:他的人生哲学是“舍大于得,坚守自我”。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为清华大学在我国教育管理和大学文化领域有这样杰出的老校友而感到自豪!我们祝愿冀生同志身体健康,能够继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方惠坚

2018年10月于清华园

前言 以人为本 走向和谐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石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我 1981 年到教育部高等教育二司工作以后一直关注的重大命题。从 1989 年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研究”到 2006 年组织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再从 2012 年《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以后深入进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之以恒的艰苦探索过程,我终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的指导下,在《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理论基础上,从历史的轨迹、文化的视角和时代的高度撰写出版了这本《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应该说,这本新作既是集近 30 年来我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大成之作,也是我学习理解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的心得体会。

(一)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从“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 1989 年起,我逐步深入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载《高等教育研究》1989 年第 1 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再认识》(载华东冶金学院《高教研究》1990 年第 2 期)、《教育方针的新概括》(载《高教探索》1991 年第 1 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基本要点》(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5期和《中国高教研究》1993年第6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论纲》(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和《中国高教研究》1995年第1期)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载《高等学校办学方向新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1993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基本要点”提出之后，我逐渐萌发了独立撰写一本《中国特色宏观高等教育学》的构想。为慎重起见，1998年9月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编辑出版了我的一本新的文集《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个基础上，2000年1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独立撰写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宏观高等教育学》。应该说，这本《宏观高等教育学》是这一阶段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宏观上和政治视角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学术研究的基本总结。

(二)

21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挑战和机遇的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争夺更加深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在开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时代呼唤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面对21世纪新的挑战 and 我国正在开启的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1994年3月退休以后，从1996年起我积极参加了这场教育思想大讨论，公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时代精神与教育观念》(载《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4期)、《跨世纪人才的主要特征》(载《高教探索》1997年第3期)、《转变教育思想是教育战线的一次思想解放》(载《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载《中国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以人为本与教育创新》(载《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年第3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载《中国高教研究》2000年第7期)、《个性发展与教学创新》(载《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1期)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载《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3期)，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在教育理念创新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初步确立了“和谐育人”教育理念，并以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目标进行了再认识。我认为,这既是面对21世纪新的挑战 and 我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一次新的重大的思想解放,也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潜心研究大学文化”、深刻揭示现代大学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坚信不疑地认定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和“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文化全面包围”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的严峻挑战,在我国教育战线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我积极投身到这场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之中,并于2002年4月撰写出版了我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方面的开篇之作《现代大学文化学》,并且倡议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逐渐深入到哲学领域,我陆续撰写出版了几本大学文化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并且逐渐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的本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于是,2012年4月我的一部新作《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在这部新作中,我以“生命论”为主导和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构建了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提出“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有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独特的组织文化个性”;“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其根基在学术,其核心和灵魂在精神——一种生命信念、价值追求、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是大学的‘永恒之魂’”,“‘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我魂’是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应该肯定,《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不仅开辟了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而且为撰写这本《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大学文化哲学基础。

(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加拿大徐美德女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 月),心灵上受到很大的震撼,既对一个外国人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内涵如此深刻的学术专著感到非常钦佩,也为中国学者没有写出这样一本分析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文化的史书感到羞愧。何况,我对书中简单地运用西方学术观点论述我国大学近代历史并不完全赞同。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撰写一本这样的学术专著。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论证,在教育部及其有关司(局)领导的宏观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先期立项,2006 年由我主持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7 年度重大基金项目“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其实质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这项课题的综合研究成果,2008 年 3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大学理念在中国》。接着,从 2011 年 3 月起,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我任总主编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个案研究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实事求是 人文日新——天津大学文化研究》(李义丹、王杰主编)、《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吴承学主编,彭玉平副主编)、《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杨河主编)、《百年清华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胡显章主编,蔡文鹏副主编)、《求是之光——浙江大学文化研究》(王玉芝主编,沈文华副主编)、《思源致远 百年神韵——上海交大文化研究》(潘敏、李建强主编)、《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潘懋元主编,郑宏执笔)、《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鹿明、蒋家平主编)、《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研究》(章竞主编)和《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学文化研究》(范培松主编)。这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五)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理想。”“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和“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逐渐深刻地感悟到：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20 世纪初“从科举到学堂”和 20 世纪 40 年代“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战线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不仅为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教育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大学精神衰微”这一新的严峻挑战，其本质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信仰危机”在我国教育战线上的深刻反映。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精辟地指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标志着 21 世纪初“从‘公平质量’到‘教育强国’”，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启一场新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并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方向、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要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促使我国高职教育向中高端进军、扎根中国大地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建设、建设一支“师者仁心，为人师表”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十个方面，初步构建了一个“21 世纪初从‘公平质量’到‘教育强国’，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

启一场新的划时代教育变革”的哲学思考体系,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六)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和大学人的精神家园,这个“文脉”和“精神家园”指的就是大学人共享的核心价值信念,它是把大学人凝聚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既是一所大学延续发展的精神文脉,更是构建大学人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通过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我认为,我国的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它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的,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五千多年来,特别是我国先秦时期以来“大学之道”倡导的以“立德树人,亲民济世”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是中华优秀大学文化和精神传统的“根”,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必将是一个在承继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念的基础上,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与西方大学文化、精神传统优秀元素和当今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变革和建构的过程。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大学是民族精神的脊梁。因此,我们既要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作为到21世纪中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工程,也应当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和“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并把它作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标志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其中,应当以“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辩证统一”的人文目标为主导,以“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科学理性为根基,以“服务社会和坚守品位辩证统一”的品位服务为方向,以“自强不息和时代精神辩证统一”的开拓创新为动力,统一到“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实现和谐”的崇高信仰之中。

(七)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上精辟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接着,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不断铸造中华文化

新辉煌”。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和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全面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谐评估新局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创办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时,发出了“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伟大号召,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上,而是应该“迎头赶上”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这才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为此,我们既要坚守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优秀元素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创造出既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光荣革命传统又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全面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谐评估新局面,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崇高目标,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八)

从本质上说,信仰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坚信不疑的认定,必然要经历一个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定的艰难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仁”和“和”的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完备而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良好愿望和美好理想,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和谐制度’是未来社会的理想制度。”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根本就在“人”,在寻求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的发展”,作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并且预言未来的

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替代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06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更加坚信不疑地认定“以人为本，走向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和人们应当为之实现进行坚持不懈奋斗的崇高信仰，理所当然地应当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

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当代中国大学人一定能够“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走向和谐”的根本方向，把正在开启的这场新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进行到底，建设一个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构建一个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无愧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时代的重大贡献。

王冀生

2018年10月于北京书屋